

下去？在社会的大变动中如何长期生存下去？实际上在全球一体化后，中华文化怎么办也是一个类似的问题，虽然并不那么急迫，而小小民族在现实生活里已有了保生存和保文化相矛盾的问题了。

因此我提出了“和而不同”的民族秩序论，心里想，我们中国当前所走的路子和所执行的政策，正是和西方的某些路子唱反调的，我们主张民族平等、民族自治，首先要保证民族生存，反对消灭民族。

我有幸在第二次学术生命里，得到继续从事民族研究工作的机会，我在这 20 年里“行行重行行”，尽可能地到各地去访问，与我国许多少数民族接触。我到过黑龙江兴安岭里的鄂伦春族和甘肃青海交界边上的裕固族、撒拉族、土族等少数民族地区，我见到他们的处境和困惑。跨入信息社会后，文化变得那么快，小民族就发生了自身文化如何保存下去的问题。在这种形势下，不采取办法来改变原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是不可能的了，问题是如何改变，所以我前年又到黑龙江去访问赫哲族，目的就是想了解一下人数特小的少数民族的具体情况。鄂伦春族面临的情况是森林发生了变化，而赫哲族本来靠渔业生活，现在他们传统的渔业越来越不景气。因此地方政府一方面努力改善环境，保护渔业生产，尽可能的帮助他们的生活，如利用鱼骨做艺术品、装饰品等；另一方面设法帮助他们改变生活方式，改变文化，给他们地种，但是他们把地转租给汉人去种或是找打工的汉人来种，这说明一种文化向其他文化的过渡并不那么简单。要生活下去和解决贫困需要有一个复兴的计划，而这种计划必须在扎实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才可能做出。这应该是社会学、人类学者的任务。

所以我从东北回来就向国家民委具体提出“小小民族”的研究建议，取得了中央领导的重视，现在由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牵头，与中央民族大学、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合作组织了队伍，开展了 22 个 10 万人口以下的“人口较少民族”的调查，第一期工作已结束，正在进行第二期的工作。我心里想在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能坐视小兄弟面临困境而无动于衷，我们有力量帮助他们生存与发展，同时要允许他们在文化走向的问题上有自主权和自决权。我们中国的社会学者和人类学者还可以做跨国的比较研究，与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的民族政策做一个比较，中国提倡民族平等、共存共荣的政策与西方民族政策究竟有什么不同。我们要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互相帮助，做出一个实实在在的榜样来，这正是社会学、人类学者要做的事，走出一条新路，其意义不仅是在国内，而且对今后的世界有重大意义。

在座的有来自各个民族的学员，希望大家来共同思考和关注这样的重大课题，民族的文化要如何发展？往什么目标发展？在全球文化发展和交触的时代，在一个大变化的时代里如何生存和发展，怎样才能多元文化并存的年代里，真正做到“和而不同”。我已经九十多岁了，想做的事很多，但已力不从心。新一代长成，老一代交班，希望新一代更快更好地成长，把研究工作继续下去。我们的高级研讨班也要继续办下去。人类共处的问题要好好解决，这是要付出代价的，甚至生命的代价。保文化就是保命，保住人也才会有文化，因为文化是人创造的，它是保命的工具。所以一切要以人为本，才能得到繁荣和发展。

## 在第六届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座谈会上的发言

费孝通

刚才大家提出了很多问题，很好，我把它们归纳起来，总的讲一讲。



我过去多次来西北，关心西北的发展问题，为此也提出过一些建议和看法。这次能参加研讨班，也很希望能了解一下现在的情况。政府政策的形成，不是凭空而来的，先是有客观的需要，以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依据，十多年来大家都在努力“呼吁”，大家的呼吁，得到中央的重视，才会有今天西部大开发的政策，这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才能做很多的事情。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贯彻落实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方向目的清楚了，有了政策条件，但要把事业做成功还要靠群众，靠每一个人的努力。

首先要做好的是交通。这次我是乘飞机来的，在飞机上没有问题，下了飞机就难走了，从机场到兰州的路还没有修好，老年人就吃不消了，这是很实际的问题，路不好，是无法招商引资的，举这个例子，大家就体会了。

其次，发展西部要有重点，要抓住若干据点和中心点。我看中了河西走廊，金川白银通过多年来的建设，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从东端到嘉峪关的一段，如对白银市的发展有相应的支持政策，可以发展成为一个工业特区。

河西走廊在新疆、青海、内蒙古和宁夏诸省区之间，要用好祁连山的水，发挥移民的作用，将会大有希望。而培养工业发展所需要的技术人才是当务之急，当地少数民族的发展也是同样的重要。第一位的任务是培养人，培养有现代科学知识的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在这方面有什么工作需要我做的，我很愿意出力。

抓重点也不能放弃基础，西部不能忽视农业的发展，发展要靠人去推动实施，靠有头脑的人去做，所以我还要再次强调，人是最根本的，必须有意识地培养和提高人的素质，让他们有条件来接受先进的文化，能够加入到现代化的事业中去。就民族工作来讲，更要抓住这个关键来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要看到传统的谋生之道正在改变，原来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现在山上的树没有了，河里的鱼没有了，有人问是保命还是保文化。文化为了人才存在，有人才有文化，文化是谋生之道，做人之道。因此我们自然要利用一切可用之自然条件发展经济，提高经济实力。少数民族也一样要靠自己的努力来发展，自身的文化不够用就引进。我们中国的少数民族有一个优势，那就是有国家的政策在扶持，有 13 亿兄弟民族的相互帮助，大兄弟帮小兄弟。经济发展要人人动手，一点一滴地积聚财富，即所谓原始资本积累，有了钱有了力量如何用？工业和商业相结合。兄弟民族各有所长，按特长有所分工，优势互补，譬如撒拉族人善于种水果，他们的瓜果之乡有了产品要有办法卖出去。回族历史上就是善于经商的民族，临夏和海东地区是明朝的茶马市场，是中原地区和北方进行物资交流的地方，是一个商业中心，历史上就有“东有温州，西有河州”的说法。所以我曾建议搞甘青两省的合作，发挥这里自然和人的条件，建设现代化的商业中心。当时为了向藏区运送商品，我还联系南京的企业向这边支援卡车。有了卡车需要人开，还要培养司机，所以要发展，重要在培养人。现在临夏的商业已有发展，回族还是出了大力气的。他们的底子比较好，学习得快，最困难的是人数很少的“小小民族”，一定要帮助他们维持生产基础，但关键也在于培养人，我认识一位撒拉族农民，他看到了问题就动手去做，动员全家开荒种果树，取得了很大成绩。

人类学就是要用思想唤起人们的觉悟，唤起“小小民族”的觉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我到过新疆的吐鲁番，林则徐在新疆时发掘过地下水，我们今天就可以他为榜样，用现代化的知识开发自然条件，促进经济发展，新疆大学要建设好一个民族学的中心，关键也在有人才，光有机构没有人不行，要培养教师，办系建中心，要人要条件，搞得不好是要误人子弟的。你们自己要好好做，北京大学出力搞协作，帮助新疆建设师资队伍。我们这次来西北地区办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如果你们做得好，我身体健康活得长，想再到新疆去办一次这样的研讨班。



西部开发本来就是一个大梦想，我一生做过很多梦，我和王同惠在学生时期翻译了《甘肃土人的婚姻》，当时她就说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写土族的书，而要外国人写。我们就是在那时下决心要努力去认识中国，自己把道理搞清楚，现在你们有条件有能力去做了，就应该认真去做，这就是所谓“文化自觉”，需要我们对自我的文化层层解剖，有所分析和认识。

我这几天还在看第三届研讨班时请外国同行来做的系列讲座的论文，很多问题他们都讲出来了，例如爱斯基摩人是如何进入工业化的。我很羡慕你们年轻人，现在你们的条件比我们好多了，简直不能同日而语了。那时我是想做而不能做，一直到平反后开始动手做。你们现在条件好了，不要生在福中不知福。自己要真正努力。

实现民族政策，不能等，要靠自己去，不能等，不能靠。民族的先进分子要看到自己的责任，中国社会是一个上有祖宗，下有子孙的社会，我们不能在自己这一代搞坏了，没有尽到责任。希望大家珍惜机会，振兴民族，共同富裕。

## 在第六届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闭幕式上的发言

潘乃谷

今天我们的第六届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要结束了。首先转达一下费老的意思，他多年来一直关心西部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他这次能亲自来参加研讨班并做主题讲演，后来又听取和回答大家的问题，有直接与大家交谈的机会，他感到十分高兴，他今天离开兰州回北京了，他希望这次研讨班的收获能在今后的学科建设中发挥作用，见到实效。

其次我自己通过这次研讨班也学习到很多东西，这么多年来能这么专心的从头到尾讲课和听大家讨论真是第一次。借此机会谈点自己有关学科建设方面的体会。

自从1979年中央委托费老牵头恢复和重建已中断27年的社会学、人类学学科以来，已是第22个年头了。今天我们教学和科研队伍有了很大发展，全国各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还在进一步的推动学科的发展，势头是很好的，就以社会学人类学的高研班为例，从1995年开始，连续六届，都得到了教育部和各地区的全力支持，还有海外学者的热情帮助，除在北京外，也到了西南、东南和西北，在这中间想休整提高一番停一下都做不到。这一次来到兰州，西北地区老师和学员们对我们的热情支持和鼓励是十分感人的，特别是年青的学者和学生对社会学人类学知识的渴求、对加强学术交流的迫切愿望令我受到很大触动，真是想讲点心里话，和大家交流一下看法，如说错了也请大家提出来。

第一，希望有志来从事和参与社会学人类学学习和工作的老师和同学们，特别是年青同志，注意了解这个学科在我国发展的坎坷历程，做为一项事业来做，要对它的重要性和艰巨性有足够的认识。对可能遇到的困难有思想准备，过去的情况我们简单的概括为“出身不正”、“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因此教委当时提出积极而稳妥的发展方针。对现在的情况，由于“速成”的做法，发展很快，水平也不能估计过高，也就是说对我们自己要有个合适的定位，要有自知之明。

第二，社会发展需要建设学科，学科也在社会发展的推动下不断成长，正像费老在重建之初时就指出的，最首要的任务，是抓培养人和建设队伍，没有好的师资，哪来好的学校？当然培养人才有多种方式，早期的讲习班，今日的高级研讨班都是办法之一，但组建好专业队伍十分关键，以北大建立和发展这个研究所的过程为例，费老最初建所的目的是以“从实求知”的态度希望立足中国实际的研究，充实教学内容，不断提高教学质量，达到既出成果又出人材的目的。他亲自把握学术方向，大家齐心协力，发挥团队精神至为重要。做组织和管理工作的要出于公心，努力

